

聊
好
书

是船，亦是家国命运的书写

打破疏离
让采访对象讲述真实经历

“2023年，我特别想写一个世界的中国企业，它能够代表中国在某个细分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在网上搜了一圈资料，我选择了‘大船’。”刘国强说。但如何走进“大船”，可谓费尽周折，刘国强翻遍了通讯录，最终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走进了这家被称为“中国军舰的摇篮”、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90多个第一的世界级企业。

“每采访完一个人，我都会连夜整理出人物小传，最多两三千字，有的百八十字，但都很精彩。”刘国强说。

如何让素不相识的采访对象说真话，讲述自己人生中的精彩片段，必须要跨越“有疏离感”的障碍。

负责现代船帆智能化设计的陈立是沈阳人，东北大学博士，但他不善言谈。刘国强启发说：“咱俩是老乡，我也是沈阳人，我觉得咱俩工作有相似的地方。”陈立愣住了：“你是作家，我一个设计师和你能有什么相似？”刘国强说：“我忙起来的时候谁都找不着我，回家跟老婆孩子都说不上几句话，每天盯着屏幕找资料，看着天花板发呆，非常枯燥，但作品出来，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。你不是也这样吗？船从加拿大开回来，哪怕是半夜你也要到码头看一眼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陈立低下头，满脸都是泪水。

“我和他在那一刻情感是共振的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和我一见如故，对我没有丝毫设防，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。”刘国强说。

采访遇到的并非都是传统工科男，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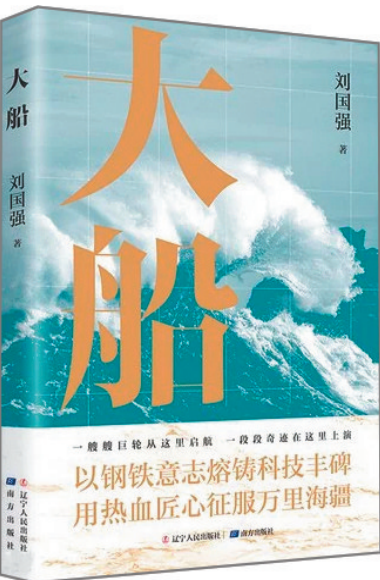
看点 “以前我去采访企业，都是‘应邀’，而去大船，是我‘硬要’去的。”从2023年刘国强动念创作一部写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大船”)的报告文学，讲述一个关于国运、船运与个体命运的故事，到真正踏入“大船”，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。

在刘国强看来，“大船”是一座“富矿”。这里不仅走出了中国第一艘航母“辽宁舰”、第一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航母“山东舰”，更有1万多名工人用生命和血汗写就的集体史诗。

焊工郭玲华倒是健谈，聊到孩子时却哽咽了。她太忙，顾不上家，女儿指着满墙的奖状说：“我要妈妈，不要奖状。”第二天郭玲华回家，奖状全被女儿撕了。郭玲华跟刘国强讲这事的时候，哭了。后来她和老公商量，哪怕一个月只能各腾出半天，也要轮流陪孩子。

还有一个叫朱先波的农民工，高中没毕业，进厂时只能当清洁工。他偷着跟师傅学电焊，没有焊条就捡电焊头，没有护目镜就捡碎玻璃片挡眼睛。眼睛被电焊打伤了，时常流泪，别人以为他遇到难事想不开，他说没事，我是烧电焊打的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后来成为中船集团首席技师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大国工匠年度人物。

正是这样一群人，汇聚成了“大船”的桅杆和船骨。



拒绝空泛
以全球视野记录“大船”往事

写《大船》的时候，刘国强特意在书房里挂了一幅世界地图，还摆了一个带灯光的地球仪。“必须以全球为视野。”刘国强说。但是，宏大容易写空，空了就没人看，他的办法是：把国运落到人头上，再把人放回历史里。

“大船”的发展历程，跟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几乎重合。自明朝发布海禁“片板不许下海”，造船业一落千丈，中国在海上落后了500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船舶工业从废墟上起步，历经自力更生奠基、改革开放出海、规模跃升第一、高质量强国转型四个阶段。如今，全球造船完工量、新接订单、手持订单三大指标连续16年保持

世界第一。

辉煌数字的背后，离不开“大船”的硬核支撑；而一艘艘大国巨轮驰骋蓝海的背后，是无数“大船人”日夜耕耘、默默付出的血汗。上世纪50年代，船厂缺人，退休老工人返厂，分文不取，唯一的要求是“中午帮我们把自带的饭热一下”。女性家属进厂打磨铁锈，一干就是一整天。

“我进厂采访之前，想象是宏观的、数字的、逻辑的。进去之后才发现，是形象的、感人的、非逻辑的。我每天接触到的，是鲜活的人和事。”刘国强说，所以这本书里，没有完人。陈立技术上一流，遇到陌生人却张不了口；郭玲华拿了那么多奖状，在孩子面前一样愧疚。刘国强把这些都写在《大船》这本厚书里。

“工业兴则国兴，工业强则国强。”这不是一句口号，是刘国强连续15年采访央企的总结。科研在图纸里，在荧屏里，要变成产品，必须通过工业。工业连着科研，连着民生，连着军事。

而“大船”就是干出来的缩影。“这么多年来，‘大船’始终是中国造船业的领军企业。它也经历过低谷，但和我们的国家一样，每一个低谷都有人顶上来。我喜欢这样的团队，无坚不摧。”刘国强说。

作者简介

刘国强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、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。发表中篇小说30部，出版长篇小说、散文集、报告文学27部，代表作有《日本遗孤》《罗布泊新歌》等。曾获中国传记文学奖、中国工文学大赛一等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。

歪打正着的误读

介子平

曲解也是解，误读也是读，且要的就是这般歪打正着的误读。

思古乃幽情，未必求其准。“男尊女卑”原指男要自尊，女要谦卑，但礼教社会需要有一个“男子尊贵、女子卑微”的圣人学理，此语最恰当不过；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”，此“毒”原为“度”，指大丈夫要有足够的度量与格局；“狗屁不通”，原为“狗皮不通”，狗的皮肤没有汗腺，需借助舌头散发体内燥热，“皮”与“屁”一字之差，点石成金，成为一句痛快淋漓的口语。再则断章取义，为我所用，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后一句是“游必有方”，“富冒险中求”的后一句是“也在险中丢”。语言的多义性，足以延展生发。

精英叙事与大众叙事，艺术叙事与日常叙事，毕竟有别。况且你以为的落日，是另一个人见到的日出，说出来，均以为对方大谬不然。声音直接入心，未经大脑过滤，起初或只是口耳相传，谐音借助，之后以讹传讹，将错

就错，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。随波逐流，忘了自己，多数人如此。

维特根斯坦认为，“语言塑造了思考，也塑造了观念”。原本之义可以塑造，误读之义同样可以。倘若一种观念无法用语言精确概括之，那么这个观念便无意义，然没有这重意义，却有另一重意义。一旦赋予某种存在概念化的语汇，便无法规避简单化、单一化、偏执化带来的误读。语言的误用，主要体现在对抽象概念的滥用和对语言本质的误解。1950年，艾伦·图灵通过著名的“图灵测试”，预言了“可思考机器”的可能性，开启了关于机器能否像人一样思考的讨论。由机器辅助到人机合作，由人机分离到机器主导，发明十二生肖的人，本是为了证明每个人都是畜生，谜底揭开，想不到这个殊途同归的畜生是个硅基生命体。生命永远在寻找新的表达，届时“人工智能不管如何进化，背后依然是人”这句话是否依旧合理，维特根斯坦让人转变思维的理论是否还

能奏效？来自空虚，身处无穷，这是一个不好轻易下定义的模糊性、歧义性、开放性的时代。

生活不按常规出牌，灵动一现的语言又有何不然，或断章取义，或编码调整，其蕴含着主体意图。典雅中正，宽博雄浑，固然唯神是守，而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言。一个词句放飞后，不知落栖哪一枝，有成为佳木繁翳、修竹茂荣一景者，也有成为枯木白草、残垣断壁一景者。一句半言变通玄，何须丹书千万片？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即可，其与语言、符号等要素一样，皆为人类表意方式与沟通体系的组成部分。意象是艺术的本体，也是语言难以精确表达的部位所在，弃用语言后，误读随之消失，唯余曲解的存在。

阅读的主体是人，人有千种，阅读的感觉也有千种。钱钟书《管锥编》论及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时说：“培根《论读书》云：‘书有只可染指者，有宜囫圇吞者，亦须咀嚼而消纳者。’即谓有

不必求甚解者，有须细析者。语较周密，然亦只道着一半。书之须细析者，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；以词章论，常只须带草看法，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。一人之身，读书之同略不拘与精细不苟，因时因事而异宜焉。”不求甚解，便是一种误读，所谓读死书、死读书，或就在求作者的原意。

阅读作为知识来源，既具传递性，又具生成性，其不是捕获文本的自动过程，而是一种栖居式的活动，且具个人色彩的重构，误读便是站在自我立场的理解。误读是对自身元认知能力、自我反思与调控能力的增强。若以标准化结论，替代个性化的理性解构，便是放弃了对文本多义性、批判性的审辨；若以智能工具替代读者的自我反思环节，意味着失去了在误读中产生歧义的机会，背离了批判商业化的外延。今天，足球商业化已深入人心，但在百年前，体育一直受制于“业余主义”。“业余主义”强调，“不得通过体育活动获取任何形式的报酬”。各主要足球会均“将足球定义为‘业余运动’，禁止通过踢球赚钱”。

识到，自身在身体素质、技战术等方面的差距。在前往柏林的途中，球队在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友谊赛，所到之处，万人空巷。奥运会结束后，球队先后在日内瓦、巴黎战胜和逼平当地的强队。李惠堂和球队就像是中国崭新形象的代言人，用出色的表现，大大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。

在赵崢看来，李惠堂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球员，他还身兼发展民族运动重任，积极投身“体育强国”事业。他提出“以足球为‘运动先导’，进而带动中国体育发展的设想，表达了通过体育运动洗刷‘东亚病夫’这一民族耻辱的愿望”。他还牵线搭桥，促成澳网网球运动员林宝华回国，代表中国参加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，终获冠军。奥运会后，李惠堂又积极投身“以球救国”历史重任之中，发起和参与各类义赛，直到1947年退役。

赵崢指出，“球王”在中国和亚洲大显身手的时代，恰是现代体育全球化传播和民族化改造之间越发充满张力的时代。在这个变革时代，体育无疑承载了凝聚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。作为当时国内体育界少有的亮点，李惠堂带领球队拼搏厮杀，“塑造了民族国家新形象，承担了社会公益的责任，代表了对理想生活的追寻”。

“球王”与中国百年“足球梦”

禾 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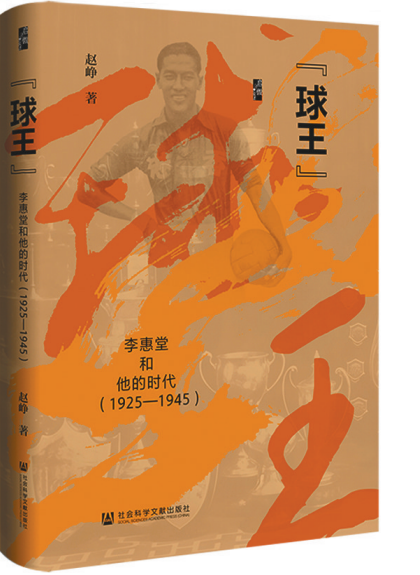
提示

1925年10月，20岁的李惠堂加入上海乐群足球队(1926年更名为“乐华足球队”)，并在对阵朝鲜高丽队的比赛中带领球队以3:1获胜，一时间引爆上海滩。当地媒体以“球之王”头衔赞誉李惠堂，坊间更是传出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”的说法。

美加墨世界杯鏖战正酣，阅读《“球王”：李惠堂和他的时代(1925—1945)》这本历史著作，既应景，也意味深长。在本书中，作者、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赵崢聚焦李惠堂足球运动生涯最为辉煌的20年。这期间，见证了李惠堂的成长，以及他为实现中国人的“足球梦”，以“体育强国”为己任的努力奋斗。

李惠堂的“球王”之路，是一条叛逆之途。从商的李父希望儿子好好学习，将来子承父业，但李惠堂从小对足球兴趣浓厚。在父亲的反对声中，他加入了香港南华队，并在1923—1924年赛季助球队夺得香港足球甲组联赛冠军。

南华队夺冠，“打破了洋人球队长期称霸香港足坛的历史”，可谓成色十足。殊不知，作为近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，在



香港推广足球运动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是有意“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加之于本土精英，使之发挥‘同化’功能”。

在随后赴澳洲3个月期间，南华队在与当地球队的24场比赛中，取得8胜7平9负的战绩，攻入63球，其中李惠堂个人贡献了31球。更主要的是，南华队员昂扬的精神状态，以及取得的优异成绩，“改变了当地居民对华人‘皮黄骨瘦，孱弱背曲’

书里书外

狄青之死与宋代刺墨制度

姚雪痕

在狄青看来，公元1053年是一个好年份。在这年5月，宋仁宗下诏封他为枢密使。这是北宋军事长官的最高官职，是皇帝对他20余年戎马生涯的肯定。

但是，这位北宋第一武将、范仲淹十分赞赏的军事天才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幕闹剧就此拉开帷幕。

按照惯例，翰林学士要在特制的麻纸上书写任命诏书，象征官职的庄重与稳固。然而，写给狄青的这一纸诏书，用的却是普通的草纸，易潮易烂，完全不符合枢密使应有的礼仪等级。

显然，这是故意的。负责起草诏书的文官，故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名将的蔑视。事实上，整个朝廷的文官集团都在排挤狄青，就连一代文宗欧阳修也连上两道奏折弹劾他。

这两道诏书，一道叫作《论狄青札子》，另一道叫作《论水灾疏》，通篇皆是谏纬之言，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，甚至连欧阳修自己都承认，狄青“未见过失”，但他还是坚持要求罢免狄青。最终，在文官们的合力之下，狄青被罢免外放陈州，郁郁而终。

《生逢宋代：北宋士林将坛说》一书，将文官集团对狄青的排挤归结为宋代“文臣压武将”制度，而文官骨子里对狄青的蔑视，则是因为——他是个驸卒。

说到这件事，这位北宋的狄大人真心冤枉。他为兄弟顶罪，在16岁那年被大宋律法烙了两个字在脸上充入军队。为了遮盖脸上的刺字，狄青在战场上总是佩戴一张面具。状元王尧臣讥讽他脸上有刺字，两人一度闹得很不愉快。得知此事后，宋仁宗下令用药去除狄青脸上的金印，以示慰藉。然而，狄青坚决拒绝了皇帝的好意，他说：“若无此刺字，我何以立足？”足以见得他内心的不甘与不平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脸上有刺字，在文官眼中，即使战功再高、皇帝再抬举，终究也是让人看不起的配军。

在有罪之人脸上刺字充入军队，这是宋代的一项制度，叫作刺墨兵役制度。《刺墨：刺写在士兵身上的宋代军事统治秩序》一书对这项制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述。宋代靠刺墨构建起“刑罚+征兵”一体统治制度，将不稳定人口编入军队，用肉体刺字实现人身管控，变相消化流民。然而，这项制度伴随宋代募兵膨胀逐渐走向畸形，军费暴涨、军队腐化、战力下降，对底层士兵的严苛压迫导致士兵逃亡、自尽事件频发。可以说，刺墨制度的崩坏，是宋代衰败的关键因素之一，这也为日后国家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

宋代有很多开明、先进的制度，比如二府三司制、税制改革、货币化改革，再比如宋代建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全国籍完整福利体系。两宋时期，工商业高度发达，百姓生活富足，唯独军事停滞不前。

整个宋代，军队的战力都是极其拉胯的。据说，有的军官为了让士兵上阵杀敌，在军营中开设赌局，自己公然出老千，迫使手下士兵欠下大笔赌债，只好到战场上积攒军功，挣下赏赐用来还债。这样的军队，战斗力可想而知。

所以两宋300年间，宋军一直在不停地被虐、不停地吃败仗。契丹人来了虐一遍，女真人来了虐一遍，就连党项人也时不时跑来刷存在感。再后来，强大的蒙古骑兵来了，宋蒙双方从长江一线开打，宋军一直打一直败一直逃，最后逃到了广东。

崖山一战，陆秀夫负主投海，10万宋军纵崖殉节，无一人投降。

唉，气节是有了，国家却没了。

枕边书

荐书人：麦家

著名作家、编剧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创作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人生海海》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60余篇、散文200余篇、剧本150余集(部)。其中，《解密》《暗算》分别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并被收入英国“企鹅经典”文库，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入选的中国当代小说。

本期推荐：《巴托比症候群》

这是我最近反复重读、感触很深的一本书。书里聊到一种很普遍的文艺现象：很多作家、演员或是各类艺术家，在创作走到辉煌顶峰之后，就再也不愿动笔、停下创作的脚步，作者把这种状态称作“巴托比症候群”。

“巴托比”这个词源自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《书记员巴托比》，故事里的主角总把“我宁愿不”挂在嘴边，作者便借这个人物，概括创作者成名后抗拒创作、主动封笔停滞的心境。

这本书的阅读方式十分自由，不用按部就班从头读到尾，随手翻开任意章节都能读。全书没有完整连贯的主线情节，信息量却格外庞大，细数了兰波、卡夫卡等一众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坛人物与文学轶事，对走在文学、艺术路上的人来说，很容易产生共鸣，值得细细品读。

本报记者 刘臣君 整理